

王汝璈 于联凯 王瑞功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诸葛亮研究三编



诸葛亮研究三编

王汝涛 于联凯 王瑞功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诸葛亮研究三编

王汝涛 于联凯 王瑞功 主编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编辑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费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185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0133-5

K·1 定价2.80元

前 言

本书是一部论文选集，收入了诸葛亮研究会临沂联会所收到的部分论文。

一九八七年九月，继成都联会、汉中联会、襄樊联会之后，临沂联会主办了第四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来自九个省市的代表六十余人，提供论文及研究成果五十余篇，供在大会上交流和宣读。会后，经主办单位与各方协商，选出三十一篇，编成这本论文集，献给关心这一研究课题的专家学者和业余研究工作者。

由于这次研讨会是继前三届会议而召开的，研究的课题便有可能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总的来说，研究从综合论述趋向于专题研究，从单向研究趋向于比较研究，从单纯研究诸葛亮趋向于研究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他的影响，从微观转入了宏观。对某些有争议的题目仍有争鸣文章，但大多能够从新的角度提出论证，资料的取用，涉及的范围更广了。由于作者来自各地，注意了地方资料的运用，使得某些论文一洗千年陈说，出现新意。例如诸葛亮的《梁父吟》，旧解多以为是“盖言人死葬此（梁甫）山，亦葬歌也”，而两篇论《梁父吟》的文章，据汉时泰山郡曾设梁父县一事，论证它本是当地乐歌，诸葛亮好为《梁甫吟》乃吟咏其曲调，或依调而为新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诸葛亮竟会爱好“葬歌”这个疑问。

随着研究的愈益深入，方法论的研究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了。书中收入了三篇这方面的论文，旨在抛砖引玉，而其中《琐议》一文，颇有新意，堪供深入研究此课题者参考。

《形象》篇，对《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不同形象，作了比较研究，这也是扩大研究领域的一次尝试。今后诸葛亮研究的领域应如何扩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中收了几篇考辨性的文章，有些对旧说或某些资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或有互相辨难者，也大多凭借资料之翔实、丰富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力求克服“圆于一曲之见”的缺点。本书罗列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表示编者的倾向性，目的亦在于引起研究者更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的不足之处，编者以为：论文涉及的范围仍不够广阔，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的文章数量太少，缺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文章，有所突破的文章少。凡此，本“双百”方针，论文尽量以本来面目刊出。编者用力较勤的是考订史实，纠正部分论据之讹误，并对文字方面，酌情作了小的删改。各篇文字风格不同，水平亦颇有参差，编者无意也无力予以整齐之。

经成都联会、汉中联会、襄樊联会同意，本编由临沂联会负责编辑。编辑小组成员是王汝涛、于联凯、王瑞功。

王汝涛执笔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论诸葛亮所处历史时代及其历史作用·····	李季平 (1)
诸葛亮研究方法琐议·····	于联凯 (15)
诸葛亮研究之我见·····	刘鸣冈 (27)
古为今用开拓前进	
——关于诸葛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周达斌 (37)
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王汝涛 (48)
略论诸葛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臧振 (64)
诸葛二论·····	王瑞功 (72)
诸葛亮的悲剧所在·····	陈启智 (84)
浅论诸葛亮的政治策略·····	李思来 (92)
诸葛亮占荆州策略思想是非浅议·····	白亦莫 (98)
论诸葛亮的法治思想·····	赵炯 (105)
论诸葛亮民族观念与民族政策的矛盾性·····	曹邦军 (115)
蜀汉兵制初探·····	许蓉生 (126)
略论诸葛亮的审时度势与通权达变·····	晋宏忠 (138)
浅析诸葛亮的“兴复汉室”·····	姜开民 (146)
是“三顾茅庐”，不是“登门自见”	
——评一篇否定“三顾茅庐”的文章	
·····	丁保斋 张孝元 (157)
论《隆中对》——蜀汉立国的总纲领·····	刘诚言 (166)

从《隆中对》看诸葛亮的决策思想·····	么大中(175)
《隆中对》与反馈调节律·····	崔学礼(185)
刘、葛关系析·····	谭良啸(191)
论刘禅·····	杨伟立(207)
诸葛亮与俾斯麦·····	常崇宜(215)
诸葛 梁父 武乡	
——读《三国志·诸葛亮传》札记·····	张崇琛(224)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新解·····	周 颖(237)
前后《出师表》刍议·····	郭荣章(246)
诸葛亮《后出师表》非伪作辨析·····	吴洁生(256)
《诸葛忠武侯文集·卷四》考评·····	李兆成(263)
五丈原古战场初考·····	王满全(272)
临沂诸葛先莹考·····	刘家骥(276)
《全裔堂诸葛氏宗谱》之我见·····	王汝涛(280)
诸葛亮与诸葛亮形象	
——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札记	
·····	丁履标(288)

论诸葛亮所处时代及其历史作用

李季平

众所周知，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同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也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本文打算仅就诸葛亮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作用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近年来学术界对诸葛亮的研究相当活跃，不仅举行过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发表过大量文章，而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范围也不断扩大，研究的内容也日益广泛。这是历史科学兴旺、发达的表现之一，自然是令人欣喜振奋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对诸葛亮的研究大都从微观角度进行，诸如有关他的家世、籍里、姓氏、生平及其在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等课题，很少有人从宏观角度或是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探讨。这些研究所得的基本结论，大体说来不外是：认为诸葛亮在政治上开明，是中国历史上贤臣良相的典范；他在治国、治军、理财上才能卓越，成就显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他的道德修养高尚，可谓中国封建社会的“正身典型”；等等。实际上这些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老课题的再认识、再研究，或是对一些新课题的新发掘、新

起步，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应当进行微观研究，相反，如果没有具体的微观研究，也就谈不上什么宏观研究，因为宏观研究是建筑在一个个具体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对诸葛亮仅仅限于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却远远不够。如果不将诸葛亮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进行宏观考察，或是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如果不将微观历史置于宏观历史之中进行研究，便想对诸葛亮作出中肯的评价，则是不可能的。具体说，我这里所指的宏观研究，主要是指不能脱离诸葛亮所处历史时代的特征及其趋势来谈其历史作用，即必须首先探明诸葛亮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情况，将其一生的主要活动放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之中，看其主要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推动还是阻滞社会历史的进程，然后才能作出有关他所起的历史作用的基本估价。如果遵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对诸葛亮作出中肯评价，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

诸葛亮生活在三国时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的前期。要探讨这段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其根本特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问题。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处于分裂、动荡状态，没有出现什么“一统盛世”，加上本段历史的资料又比较繁杂，缺乏综合整理，致使这段历史长期被人忽视或是遭到某种程度的曲解。例如，在近世以来的历史著作中，有的就把当时由中国西、北边疆内迁并建立短期政权的少数民族视为“五胡乱华”，

把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称为中国历史的“中衰阶段”，甚至用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加以比附；即使解放后一些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指导下，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对上述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说法有所纠正，但仍然有人强调它是“乱世”，认为当时社会曾不断遭受破坏，生产长期陷于停滞，夸大其消极面，竟认为它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倒退”时期。这说明上述一些片面看法的残余影响尚待肃清。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它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首先，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确立之后进一步封建化的时期。其次，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不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这一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和贡献。的确，在这段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明显的曲折，但总的来说，我国封建社会在这时还是缓慢地向前发展着，而非“停滞”。如果不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孕育和发展，便不会有隋唐封建制的高度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

首先，如何认识我国封建时代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众所周知，只要是封建制社会，它就存在着封建割据的因素。因之，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并不是始终统一的，它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我们不能对分裂时期的历史一概予以否定，还要具体分析在分裂局面下的社会历史是否还有某些方面的发展；还要看其分裂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当然，一般地说，统一的局面总比分裂割据状态对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有利，而且统一乃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因为中

中华民族具有要求“大一统”的优良传统，纵然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分裂局面，而这种局面也往往是暂时的，实际上随着历史的推移，统一的势力总会战胜分裂的势力。这除了中华民族具有要求“大一统”的传统这一力量外，另一重要力量就是各族人民总是在斗争中趋于融合，这乃是一种历史的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及互相学习、交往，一直在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结果出现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和江南的经济开发，并形成了新的江南经济区。这些乃是本段历史发展的积极结果。

以此观点去考察历史，则可将魏晋南北朝看做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统一的秦汉时期向更加宏大的隋唐统一局面转进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换言之，隋唐时期之所以出现空前统一、繁荣的局面，乃是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积极成果。

第二，如何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在这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其经济都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南方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已开始南移，并在淮北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区。这种经济形势的出现，是以孙吴政权在江南的开发开始的。在长江上游的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地区，本来就是土地肥美、桑梓接连的地方，再加上都江堰的灌溉工程，农业生产一向比较发达。这时期由于蜀汉政权的开发和经营，可以说比之两汉的全盛时代也无逊色。总之，整个南方的社会经济，在上述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第三，如何评价门阀地主的问题。门阀地主乃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形态之一，也有其产生、发展和衰

亡的过程。远在西汉中叶，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开始成熟，即出现了一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及至东汉，门阀地主即已孕育形成。魏晋以后，门阀地主上升为地主阶级中的当权派，形成了门阀专政的时代。直到南北朝的晚期，它才开始转向衰落。在门阀地主演变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学术界的意见不一。不少同志认为它一出现就是一种腐朽势力，在历史上从未起过好作用。有的同志则有不同的看法，如郑欣同志在《如何评价门阀地主》（见《文史哲》1985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门阀地主在它的前期是进步的，以后才转向反动。特别是在东晋至南北朝前期，它所起的进步作用尤为显著。这主要因为门阀地主所役使的劳动者是具有世袭农奴身份的佃客和部曲，所以它代表的生产关系是世袭的农奴制度。佃客、部曲的地位在当时比较稳定。这种稳定的地位，对障碍着封建社会发展的残存的奴隶制，具有堵塞其发展和一定的肃清作用。另外，在当时北方民族融合的洪流中，由于各少数民族纷纷汉化，它的贵族也都先后门阀化了。因此，不管是侨姓门阀征服江南的土著地主，还是汉族门阀征服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本质上都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总是文明的一方取得最后的胜利。由于这种征服所带来的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北方民族的大融合，直接为以后隋唐封建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大约到了南北朝的晚期，门阀地主才开始转向衰落。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见解。由于魏晋以后直到南北朝的晚期，曾是门阀地主当政的时代，因此在探明魏晋南北朝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时，必须对门阀地主有个基本的估价。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古代史中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历史时期，其间虽然长时间陷于分裂状态，北方的社会生产又多次遭受严重破坏，但总的来看，这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还是缓慢地向前发展着。特别是由于各民族间长期斗争，更多的则是互相学习和渗透，终于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和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并开始孕育、生长着另一个重要阶段的历史，从而直接为隋唐封建统一、繁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大体已如上述。但要探明诸葛亮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就必须结合其一生主要活动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估价。

首先，关于诸葛亮在当时的历史大势中有何作用的问题。诸葛亮被不少人誉为封建时代有远见的政治家，而最能反映其政治远见的，莫过于他的《隆中对》。他在这里纵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提出了三国分立的思想，向刘备建议“若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刷新内政，积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再北进中原，则统一大业可成。《隆中对》对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它是诸葛亮根据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发展前途，而提出的方针、任务和策略。但客观实际与《隆中对》对形势的分析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诸葛亮的三国分立思想与后来的历史发展虽相吻合，但其“跨有荆、益”的计划并未能实现。这—是因为荆州与益州在当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二是因为“跨有荆、益”与“外结好孙权”之间构成矛盾。另外，

诸葛亮对客观形势的认识与其主观行动之间也不很一致。例如他明明看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的客观形势，却又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为理由，利用刘备系西汉皇室后裔的传统宗法观念，以“正统”为号召，不断出师北伐。这不论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政治思想或是什么“以攻为守”的战略来为诸葛亮的这些活动辩解，都不能把他的这种做法说成是顺应时代的，也不能掩饰他对历史趋势在认识上的局限。实际上他的行动，是想以一个割据西南的小国来与控制着中原地区的大国相抗衡；他的连年用兵，不断北伐，只能大量消耗国力、民力，给蜀国人民带来严重的征役之苦，并使其争取蜀汉民安国理的治绩受到损害，终使他“统一”大业的努力成为徒劳。这些，都不能不影响着他在历史上所能起的积极作用。

这里所说的封建社会的统一，一般是指一个政权运用其军事、政治力量，对全国的暴力支配。它往往是进行兼并的结果，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性的统一。当然，就是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统一，其作用、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秦的统一六国，就带有向全国推行先进的封建制、扫除奴隶主残余势力的进步作用，而诸葛亮的北伐、统一活动，并不带有这种推行先进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是企图用兼并手段以达其暴力支配全国的目的而已。至于封建社会的所谓分裂，实际上是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各种政治势力构成均势的情况下在政治上的反映。兹以三国分立而构成的分裂局面而言，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的膨胀，使政治分裂倾向日益加剧。其次是南方经济（包括长江上游及中下游）得到开发，孙权、刘备两集

团的经济实力日趋雄厚，而北方生产在东汉末年遭到严重破坏，曹魏时虽有恢复，也未超过南方的水平，因而在全国形成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为分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是魏、蜀、吴之间也形成了军事实力的某种均衡，彼此都无力消灭对方，因而导致三国分立。这种局面绝不是某个政治家如诸葛亮辈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三国分立这种局面虽属于政治上的分裂，但与东汉末年的大分裂相比，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它为西晋时全国的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关于诸葛亮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中有何作用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从时间来看虽主要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从地区上说也主要在北方，但“主要”并非“唯一”，因为在其他时间和地区也存在民族融合的事实。例如三国时期诸葛亮担任蜀汉丞相时对待南中的民族政策，也是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组成部分。诸葛亮推行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时，虽也曾亲自“南征”，用过军事镇压手段，但主要是采取怀柔方针和攻心战术。所以说他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温和的，或者说还是比较开明的。关于他对南中民族政策的全盘计划，虽不得其详，但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的记载，可以窥知它的两项内容：一是“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二是“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诸葛亮认识到，如果派内地人去当官吏，同时就要留驻汉兵，而“兵留则无所食”，这不仅增加南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负担，还会导致民族间的隔阂。只有起用当地各族上层分子，才能做到“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诸葛亮“南抚夷越”的主观目的，乃是为了解除他

对抗曹魏的后顾之忧，并控制南中地区，剥削那里的金、银、犀革、牛、马等资源以给军用（《华阳国志·南中志》）。但诸葛亮在对南中进行剥削的同时，还把中原的封建生产关系带到西南地区中去，同时也注意了该地区的生产发展，水利兴修，而且输入蜀中经营盐铁和织锦的技术，与南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而摧毁了当地落后的奴隶制，使那里的社会性质起了剧烈的变化。因之，诸葛亮在南中推行其民族政策时，客观上所起的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第三，关于诸葛亮治蜀政策的作用问题。诸葛亮治蜀的方针政策，除了前述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三国分立的基本策略，即对外抗击曹魏，结好孙权，并在受刘备遗命辅政后，努力恢复因争夺荆州而破裂的蜀吴联盟外，他的对内政策，主要是刷新内政、发展生产，创造对抗曹魏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方面虽曾取得了明显成绩，但还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一下刘备、诸葛亮政治集团的主要活动，是代表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才能认识其实质及其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众所周知，刘备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在灵帝末年，他即组织地主武装，后以镇压黄巾之“功”，累迁至高唐（治所在今山东禹城西南）令，从而参加到东汉末年军阀武装割据的活动中去。刘备以诸葛亮为股肱，先是取得江陵，进而入蜀，夺取了刘璋的益州地盘，自领益州牧，奠定了他在益州的统治权，后又攻取汉中，进一步巩固了益州的防务。刘备、诸葛亮在益州，对文武官员的使用，曾照顾到地主阶级的各个集团。首先是对追随刘备转战中原、后又随之入蜀的

“荆楚群士”（《三国志·蜀书·刘巴传》）予以重用，史书所谓“豫州（指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华阳国志》卷九），就是反映这一事实的。其次，对随同刘焉入蜀的刘璋旧部，也都一一加以拉拢。通过这样的手段，刘备、诸葛亮集团得以巩固了蜀汉政权。这里所谓“荆楚群士”，实际上就是荆楚地区的一些豪强大地主，由于刘备、诸葛亮对这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优渥、使用，自然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就以诸葛亮本人来说，他本是琅邪阳都（在今山东沂水县境）人，家世二千石的大官。在东汉末年牧守混战之时，随其叔父避难荆州，后又移居隆中，曾自比管（仲）、乐（毅），自然是“荆楚群士”中的知名人物。刘备重用了他，则容易博得更多荆楚豪强大地主的拥护。至于刘备、诸葛亮对待益州的土著地主集团，则采用既打又拉的策略。他们一面大量吸收益州土著地主入朝，甚至还破格录用其中某些代表人物，同时却对其中的个别不稳分子，予以无情打击。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仍然继续这样的做法，故能把入蜀的荆楚地主和益州的土著地主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巩固了蜀汉政权。应当肯定诸葛亮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应指出，刘备、诸葛亮政治集团的活动，主要是代表一些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但在当时蜀汉区域内是上述几个地方的豪强大地主的联合专政，尚不是门阀专政。因为这时蜀汉地区的门阀世族地主的势力尚在发展；形成门阀专政还是魏晋以后的事。例如蜀汉统治时期，不仅没见有象东汉时“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或是“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那样的门阀大地主，也没见蜀汉政权颁布有象九品中正之类保障门阀特权的制度。另外，就以诸葛亮本人来说，他居官